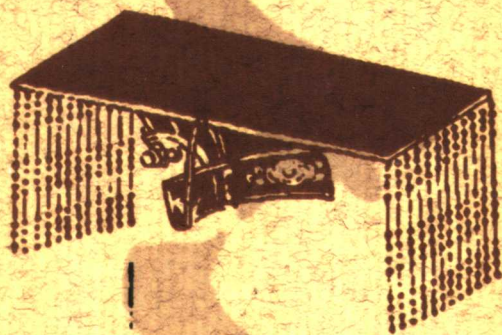


历史上的 一种人

皇帝
官吏
草民
政治博奔真相

LISHI SHANGDE SANZHONGREN



綦彦臣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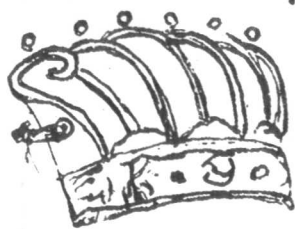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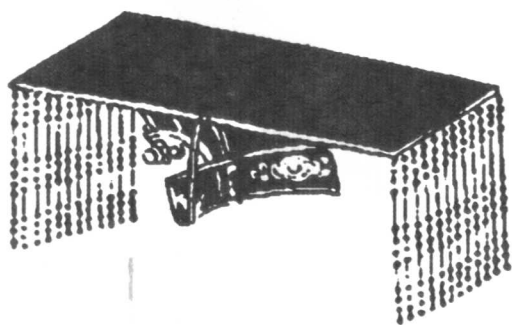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历史上的 一种人

皇帝
官吏
草民
政治博奔真相

綦彦臣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上的三种人:皇帝·官吏·草民政治博弈真相/綦彦臣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ISBN 7-300-0664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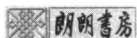
I. 历…

II. 綦…

III. 史评—中国

IV. K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38037 号



历史上的三种人——皇帝·官吏·草民政治博弈真相
綦彦臣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编辑热线:010-82503013

网 址 <http://www.longlongbook.com>(朗朗书房网)

<http://www.crup.com.cn>(人大出版社网)

<http://www.tt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中煤涿州制图印刷厂

规 格 150 mm × 229 mm 16 开本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张 20.5 插页 2 印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23 000 定 价 26.8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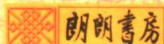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本书是一部通史点评型的通俗作品，以社会学的方法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特定人群及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如皇帝雇凶杀权臣、对妇女的摧残刑罚，等等。通过历史描点，努力勾勒出一幅“温柔的血腥”画卷。在温柔的君臣父子、勤政爱民、忠君报国的道德面纱背后，存在惊人的血腥：皇权集团在社会顶端同时奴役官僚与草民两大群体，官僚群体又在利益分配中表现为上欺皇权、下压百姓的贪婪本质；而草民社会总是在默默承受中等待着极限的到来，推翻皇权。

作者所要寄托的不是限于揭露历史的丑陋，而是期望建立一种历史新思，使中国社会避免一次又一次的历史相似，为和谐社会的建立提供有益的历史营养。

本书历史逻辑清晰，理论概括精当，以历史事件为主体，叙事翔实，是一本近来少有的历史通俗之作。



long-long Book House

网址：www.longlongbook.com

发行热线：010-82503022



綦彦臣，经济学者，历史爱好者，自由撰稿人。河北泊头市人，曾在国有商业银行、政策性银行工作。因对金融危机的研究，被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軾称为“中国金融反危机理论第一人”。历史著作有：《中国人的历史误读》（中国出版社，2005），《中国古代言论史》（航空工业出版社，2005）。

策 划 / 思 科

责任编辑 / 张 杰

版式设计 / 孟庆磊

装帧设计 / 奇文雲海

自序：片面的深刻与文明的自省

中国文明之为狭义上的文明，概发于汉而定于唐。汉承秦制，在政治硬件方面除了将郡县制改为封建制外，余无更张。至于儒学真正成为法定意识形态，已经是西汉后三分之一时间里的事情了，至东汉，儒学乃大为兴盛。然而，儒家那套礼义制度或曰转化为礼仪廉耻的文明意识，在东汉结束后，遭到了无情的颠覆。从公元220年曹丕强行推演尧禅舜继的古装戏，把汉刘家想作傀儡都不得的刘协赶下台，到公元589年杨坚初步统一，中国自秦以来大一统的天下为此付出了三百多年分裂与战乱的成本。

唐朝兴起，有鉴于儒家文明边际效用递减的史实，认准了佛教。于是，发微于东汉，形成于南北朝的本土化佛学，在唐大为兴盛。

佛家把儒家礼义廉耻的复杂程序化简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①的通俗准则，从此，中国成了儒佛交融之国。但是，无论“礼义廉耻”还是“立地成佛”，都没有能使我们的文明真正地健康发展，反而是灾难愈加深重。

也许这种评判是片面的深刻，但是在儒家的朗朗书声中，在佛家的念念佛语中，真实的世界实在是残酷不堪，甚至残酷得有些滑稽。

文明的温柔背后有太多的血腥史实。有的是在彬彬有礼下的

^① 此语最早见于南宋高僧释普济《五灯会元·东山觉禅师》：“广额正是个杀人不眨眼底汉，颺下屠刀，立地成佛。”此处引用只为意解。另外，南宋朱熹在其《朱子语类》与清代纪昀在其《阅微草堂笔记》均引用过此语。



算计,一如后世《增广贤文·一法通》上所说的:“当面叫哥哥,手里摸家伙。”^①有的则干脆是无情的吞并与狂暴的杀戮,一切都简化为“武力”二字,八王之乱、五代十国、扬州十日不都是狂暴杀戮的缩略语吗?还有,在文明驯化的核心理念里,又派生出无情的愚弄与压制,妇女的地位卑微与被压抑而成的狭隘,成了我们这个文明的残疾。西方哲人说过:“一个好母亲顶得上一百个好教师。”^②这话至今约有近200年的时间了,与我们文明中的“夫为妻纲”相比,实在是稚嫩了一些,但今天我们不得不面对“母亲缺失的危机”^③。

在片面深刻的“场景”下,我们也实在地看到了文明衰退冗长的悲剧。如果我们无心按大部头史学经典那样来复现历史,不妨以剪辑的方式从历史中抽取片断。在我们引以为历史骄傲的唐朝,一位端坐在合法继承来的皇位上的人,表面上口口声声地称扶他上台的老先生为“尚父”,比作周朝的姜尚(子牙),但他又忍受不了尚父的专横。无可奈何,他收买了黑社会,以行窃为名,到尚父家里干掉了这位碍手的权臣。皇帝雇佣黑社会杀人成了历史上的奇闻。虽为罕见,但也表明了皇权与官权是处在互相博弈的状态,而不采取雇黑方式除掉权臣(且不分什么忠奸),那就得使用阴谋,罗织罪名,栽赃陷害。

雇黑的皇帝叫李豫,被杀的权臣叫李辅国。在整个历史中,他们也只是“现象学上的符号意义”;同样,使用阴谋除掉岳飞的赵构与近乎政治盲人的岳飞,也只有符号意义。

从历史中,我们可以抽象出许多道理。

还是在我们引以为文明荣耀的唐朝,一位由原来反叛者而来

① 《一法通》上另有“口里甜如蜜,心里黑似漆”语句,版本见参考文献第29。

② 语出斯迈尔斯《品格的力量》中译本,34页,宋景堂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1年。

③ “母亲危机”为自由学人、著名母亲教育专家王东华于1999年提出,其著作《发现母亲》由中国妇女出版社于1999年出版。

的“忠臣”把他的主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几乎重演了董卓的一幕。被迫从长安迁都洛阳的皇帝对向他献上崇拜的百姓说：“别叫我天子了，我已不是你们的皇帝了。”他说的对，几个月后，他就死在了权臣手中，又过了几个月，他最后一个儿子和老婆也被“处理”掉了。

那个唐代的董卓叫朱温，那个连汉献帝下场都没捞到的皇帝叫李晔。

故事尽在书中，在此无须罗列。

再看官与民的关系，“中国第一县令”黄梅像他许多同行业前辈一样，遵守着一个行规：除不要脸以外，其他什么都要。黄梅开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张政府打给农民的收粮白条，作为“中国第一县令”，他创造了一个奇迹。当农民拿条子换钱时，他再狠狠地扒你一层。好在黄梅是在清朝的乾隆年间而不是唐朝的黄巢时代，否则他会被急红了眼的草民给吃了的！为了钱，这个文人出身的官员竟然在母亲猝死后继续唱大戏。结果，为礼教所不容，道德风波引出了经济问题。他竟然用谎言维持了在一个县十多年的统治，被治傻了的老百姓没一个敢告他。在他案发后，几乎没人敢给调查人员作证，因为在明代早就有如王艮那样的明白人告诉人民：忍着，千万别惹事。

道德再一次翻版成了谎言！

当然，民虽愚，并非没有理性计算成本。换言之，当他们觉得忍无可忍的时候，干脆就舍弃了最后的理性，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们无不如是，至于成功的和尚“反贼”朱元璋就不必细论了。

“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多么好的诗句，可惜，这只是又一次杀人的宣言。

中国封建社会两千多年的文明史大多是在温柔的血腥下度过的，除了战乱兵灾、旱蝗水涝，还有数不尽的人祸。在严刑峻法刀头



下死掉的无辜冤魂绝不比让马蹄踏死的无辜者能够多喊一声“苍天啊！”，血光与肉泥书写与裱糊着一代又一代的“温柔的历史”。

这是怎么回事？

元代著名词人张养浩在被迫带着冤屈接受皇帝的任命后，去陕西救灾时，经过潼关，他突然找到了答案。其曲〔中吕·山坡羊〕《潼关怀古》道：“峰峦如聚，波涛如怒，山河表里潼关路。望西都，意踌躇，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间都做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如果说战乱可以凭实力人物的良心发现得以避免或减到最低程度，愚民政策也可通过所谓的启迪民智来渐为改观，那么对妇女的残酷压抑，则是我们的文明之耻，也是我们这个文明至今缺乏母亲的根本之所在。

《水浒传》以宋史为原料，以作者所在的明代为映衬，其所写武松杀嫂、杨雄杀妻，绝非夸张，而王婆骑上木驴的酷刑虽不在官方明列的妇女五刑之中，但也是一种辅助教化工具。这种刑具，以横木上一根坚韧细杆或干脆就是铁钉朝天而竖，女犯被从高处放下，竖杆正插入肛门或阴道，直贯口腔，几日后才得死亡。

残忍不残忍？缺德不缺德？

文明的某块基石早已让女人的阴血给浸透了无数次。

而对妇女训诫的一切伦理根源完全来自于一位女历史学家对孔圣人“唯小人与女子难养”定性的诠释。班昭的《女诫》让我们这个文明不再敬畏女人的阴部，反而使它成了权欲加淫欲及窥视癖发泄的靶子。班昭的理论核心是：“生男如狼，犹恐其尪；生女如鼠，犹恐其虎。”尪者，弱也。如果一个男人像狼一样凶残，还嫌他羸弱，那么，比老鼠还弱的女人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

在温柔的血腥中，更有一种牢不可破的“玩国家”观念。它是一种更深度的残酷，或者说更血腥的温柔。民国以前的历史中，我

们的文明虽以国家形式续存，但每在危难之际，国家就成了政治赌徒们的筹码。至于吕不韦那种史书已讲滥了的故事，无须重复了；还有，确立了伍子胥与伯嚭关系的细节，此处也不必细述。看一下唐末的董昌，你会又笑又怒，又叹又怜。他以军事实力割据，逼迫国家承认割据事实，再以巨额贡赋向朝廷索取王爵。

这笔交易最后搞砸了，结果他成了另一个玩国家高手的筹码。

这是钱鏐取代董昌、世为越王的故事。

国家愈衰，玩国家者的数量就越多。北宋末年，童贯玩国家，去收复幽燕十六州，结果引得金兵进汴，赵佶父子皇帝成了北方的囚虏。南宋更加衰败，先后有韩侂胄与贾似道各玩了一把，结果本可维持的摊子全面破产！

如果童贯不是玩砸了，稍遏功利之心，也是做太监而封王的“历史人物”，他将像许多民族英雄那样图挂凌烟阁。贾似道也是如此，作为骗得荣誉的“民族英雄”，他再一次在细节上颠覆了儒家的教义。什么君臣父子，连皇帝都要给他下跪。因为此前他已经制造了一个神话：没有我贾似道，这个国家就玩不转！

官比皇帝大，这是个平常人无法想象的历史现象，而就本质来说，皇帝与官员无非是政治市场的交易者，他们要从事各种条件下的交换。在皇家供给资源相对紧缺之时，也就出现了“不要脸的文凭”现象。多少士子为求登榜而放弃了廉耻，而即便放弃了廉耻也不见得换来认可。官场本质就是智力投资市场，所谓“千里当官，为了吃穿”，所谓“当官不发财，请我也不来”。所以，只有认清了交易本质，才可能理解乃至体谅古代官场上为什么“没有人能把反腐进行到底”的窘境。

在罗列完历史伦理化之后，要说的是写作技术上的问题。首先，之于中国历史典籍丰富之状，要把庄严的宏大叙事转化成与大历史观并不冲突的细节描述，需要的是精心选材，将“正史”中的刻



板描述逻辑化为“生活场景”。其次,是在正史之外尽可能多地选取为史学家所认同的笔记历史。中国历史在本质上是“半史在记”,文人笔记的丰欠既代表着那个时代文化的繁荣与衰败,也同样预示着相邻下一代历史著述的丰满有否可能。

即便是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史记》,也多取材于“野史”(笔记的最初形态),如三代世表之写法多采用《谍记》与《五帝世谍》的材料,至于管仲晏婴的传记则多采管氏《牧民》等篇章及《晏子春秋》,凡此等等。

对古人笔记的采用,于现代中国史学家也多有所为,如著名的政治史大家周谷成在《中国政治史》中不少资料都引自“正史”以外的笔记。其引述范围之广,令人耳目一新,从郑樵《通志略》到赵翼《陔余丛考》、《廿二史札记》,再到顾炎武《日知录》乃至钱大昕之《十驾斋养新录》,不一而足。

周老先生之《中国政治史》成书于1940年,重印了四次,到1981年又出了修订版,实在为中国自民国以来少见的史学力作。它也是我的历史启蒙读物之一。另一本则是夏曾佑老先生的《中国古代史》。可惜的是,我只读了夏著的上册(从上古至隋朝,1933年版)。在周老先生之后,对笔记采用较有功底的非任继愈先生莫属。其《中国哲学史》(1964年版)虽有不少阶级论之“革命话语”,但其引证、考证之功确属上乘,从而使《中国哲学史》有了成为传世之作的可能。尤以引用李贽之《焚书》论《水浒传》为最著,李贽让掌国者熟读《水浒传》,并大胆预言:“否则(忠义)不在朝廷,不在君侧,不在干城腹心。乌乎在?在水浒。”

由于这段“非正史”引证,使人认识到晚明中国政治之不可救药。

中国古代笔记作者有些还是重大社会剧变过程的见证人及这个变化过程的细节观察者,其记录更贴近现实,为以后的历史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如元末明初叶子奇之笔记要较明代之《元史》

叙事清晰，其概由叶子奇本人亲身经历所致，如其对民谚的记录既真实又生动，印证了元末重大事变的社会心理状态。今日之新版《元史》（周良霄著）中引述时谚对元朝晚期吏治的评论，读来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而所引出处就是叶子奇《草木子》笔记所记。其记云：“廉访司官分巡县，每岁例用巡尉司兵弓旗帜金鼓迎官，其音节则二声鼓一声锣；起解杀人强盗，亦用巡尉司金鼓，则用一声鼓，一声锣。后来风纪之司赃污狼藉，有人为诗嘲之曰：解贼一金并一鼓，迎官两鼓一声锣。金鼓看来都一样，官人与贼不争多。”

此类的例子还很多，哪怕只作个提纲式的介绍，也不可能在简短的前言中全部列示。至于历史笔记之采用，我尽量采用两条标准：一是已被当代史家使用过的，确实印证了时代背景，如对科举考试相关的记闻；二是对十分优秀的笔记相关条目的采用，如对《陔余丛考》中唐朝王爵滥（贱）之记、南宋将帅富奢之记，等等。

在“且述且作”的自我立意上讲，《历史上的三种人》也算一部历史笔记吧，只是每节太长了些。当然，形成3篇9章27节的整体布局也是由于我力求写一部“标新立异”的“私修巨史”之故。

作者虽于史书涉猎颇广，但恐庞杂不经，所以在本书写作结构的内含学术化即“皇帝·官吏·草民三种人政治博弈模式”之外，还用心选取了与主题密切相关的插图，并予以文字解释。这样好像有点抢编辑工作的嫌疑，但是它至少有以下好处：一是用高度相关的图片作陪衬解释，能使读者产生更多感性认识；二是避免时下图书插图过滥且相关不大的毛病（这大多是由于作者与图片编辑沟通欠缺造成的）；其三，帮助文字编辑更好地把握史料的准确性。但一部好的历史通俗化作品需要作者与编辑更好地协作。“协作”二字绝非客套，据我以往的经验如写《中国人的误读》与《中国古代言论史》来看，编审历史书稿的难度远远大于普通作品如励志、经管类的。



以上罗列，大体说清了写作意图及本书要旨，不再多叙，敢引白居易《与元九书》结尾语，结束本序：“引笔铺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次第，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之话也。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蔡彦臣自序于 2005 年 12 月 1 日

于乡下含溪轩书房

目 录

皇 帝 篇

第一章 秦始皇高又如何 (3)

两次无故逮捕都发生在公元前 195 年。这一年，他也死了。连萧何、樊哙都不被信任，可见刘邦疑心之重，手段之不讲道理、不顾情义，真有点“临死不留面相”的味道。

一、寡人之疾在心里 (3)

二、盛世君王患“疯病” (17)

三、皇帝性生活关涉王朝变局 (29)

第二章 面对权臣与面对外邦 (39)

李豫在叫了李辅国半年“尚父”后，收买了一个强盗，深夜进入李辅国居室，砍下李辅国的头颅，外加一只手臂。一个堂堂帝国的皇帝动用黑社会去刺杀无法驾驭的权臣，实属罕见之举。

一、当政治玩具的滋味 (39)

二、多种贿赂策略 (53)

三、怎样和外族人论辈分 (57)

第三章 训导机制失灵 (70)



纵观刘欣短暂的一生,实在也很不容易,也就是说他“要叉”真的要对了。当然,这仅是就个人生活方式而言的。《二十五史纲鉴·历代帝王一览》评价刘欣说:在位六年,寿二十五岁而崩。《谥法》:“恭仁短暂曰哀。帝欲收揽权柄,然制于傅太后,过宠于董贤,主德不匡,汉祚遂微。”

- 一、压抑下的放纵 (70)
- 二、给坏蛋们一个狂欢节 (76)
- 三、玩它个天昏地暗 (81)

官吏篇

第四章 反腐败:历史不能承受之重 (91)

黄梅集团的人把折银(顶米)的价格抬高,比正常时高出一倍。也就是说他的执法利润率高达100%。看来,天下事没有比把法律当买卖做风险更低、收益更高的生意了。

- 一、“不肩好货”的理想主义 (91)
- 二、皇权与兵权的交易 (99)
- 三、中国人的“在礼病” (114)

第五章 官场大超市 (124)

试图贿赂考官的一万两银子,足够周家吃用50年的。也就是说,鲁迅的爷爷要把那一万两银子用在家计上,到1943年时,他家的生活水平也能在绍兴稳居中上层水平。

- 一、粮食时代的事情 (125)

二、古代的文凭混子	(134)
三、个体品质的悖论状态	(146)
第六章 把国家当做筹码	(160)
司马孚已经 86(虚)岁,以垂暮之躯再为哥哥的孙子效力,又干了 7 年,以 93 岁高龄辞别人世。这只狡猾的政治狐狸,比他哥司马懿多活了 20 岁。作为“八达”之一,他是唯一看到孙子辈篡权成功的人。	
一、谁能长得前后眼?	(161)
二、一个奇特的历史公式	(174)
三、是赌场也是屠宰场	(190)

草 民 篇

第七章 傻子还是少了些	(211)
王永彬则把这种利益关涉予以极端化解释:“一言足以招大祸,故古人守口如瓶,惟恐其覆坠也;一行足以玷弱身,故古人饬微躬若璧,惟恐有瑕疵也。”虽然极端化,但也不无道理。	
一、惠良机制:儒不足还有佛	(211)
二、女性受压抑的历史	(227)
三、启蒙的无奈与负效应	(241)
第八章 民有三死	(251)
五代时期的最后一代周朝,有法条云:带一斤私盐即为重罪,能捉一斤以上者必得厚赏。如此缺德的法律不但使大量的人被判了死刑,也刺激了无	



赖之辈诬陷他人的卑劣行为,甚至连素称行善的尼姑也参与到其中。

一、法死:恶法杀人人如草 (251)

二、战死:草民作为国家的赌注 (258)

三、饿死:没有粮食吃人肉 (268)

第九章 成本昂贵的简单复制 (275)

历史的流变似乎与整个中国文明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后来不懂什么叫革命的人们屡屡把叛乱与政变说成了“革命”。其实,如果“周革殷命”还勉强称得上一次“革命”的话,那么,中国历史上皇官民三角关系中自此以后再也没有发生过革命。其间的种种重大社会变故,不过是简单复制以前的样子而已。

一、被不良分子损害的国家 (275)

二、暴力革命的后遗症 (290)

三、沉重的历史反省 (299)

全书主要参考文献 (310)

后记:搜书,写书,出书 (312)